

文化身份的认同和构建多半是乌托邦

刘成富

当今，文化身份的认同和构建已经成为不同文化群体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它与种族矛盾、民族仇恨、文化冲突、霸权文化、全球化等概念密切相关，成了人文社科领域一种充满活力的理论话语，也是外国文学研究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在这里，我们重点探讨阿尔贝·加缪、玛格丽特·杜拉斯、米兰·昆德拉、勒克莱齐奥、让-克里斯托夫·胡方等五位现当代法国作家，旨在凸显文化身份的认同和构建与现当代法国文学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揭示其非同寻常的认同和构建过程，堪称酸甜苦辣，而且多半具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杂糅的”文化身份构成了作家们的宿命。

自古以来，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在北非土生土长的加缪受到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双重影响，长期处境尴尬，左右为难。他彷徨和困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为“黑脚”一员，生活在一个“没有过去、没有祖屋、没有堆满信件和照片的阁楼的地方”。从民族身份上来说，他是法国人，但是他的文化身份是飘忽的、模糊的，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东道主》《第一个人》的作品中发现这一点。在《第一个人》中，加缪以自然朴实的文字表达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内心世界的深切感受，带来了读者一次精神返乡的巡礼。他既没有以法国人的身份美化法兰西帝国的殖民行径，也没有站在阿尔及利亚人的立场控诉殖民强盗的罪恶，而是以“第一个人”的口吻，即没有身份、没有过去、从零开始的个人的角度对生命进行了探寻。主人公的寻根之旅，实际就是作者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和构建。

在《东道主》中，“东道主”既没有勇气站在法国人这一边，也没有勇气走向阿拉伯人的那一边。面对穆斯林罪犯，主人公达鲁迷失在人迹罕至的荒漠上，期待并寻觅着在独立王国里能够行使绝对好客的权利，可是“在这片无法改变的土地上，人类、种族、宗教互相对峙，从来没有和解，从来无法承认共同的规矩，从来不向同一个上帝致敬”（Camus, 1962: 1621）。阿拉伯人与法国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成了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达鲁很无助，因而“仰望长空与荒原，还有那通向大海的无垠大地。面对他一往情深的大海，这又是何等难耐的孤独啊！”（柳鸣九，沈志明，2002：340）

加缪生活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夹缝中左右为难。他试图为自己构建一种所谓的“地中海文化身份”，因为他对法国的感情与生俱来，而阿尔及利亚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亲身经历了殖民地的贫穷和苦难，对法国殖民制度深恶痛绝。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矛盾让他骑虎难下，莫衷一是。他既要维护阿尔及利亚的利益，又要站在法兰西的立场抵制反对穆斯林民族独立运动。加缪摇摆不定，最终选择了妥协。他希望为自己构建一种包容的身份，以此来消除隔阂，达成妥协。这种身份的认同和构建有一定的代表性，至少代表了绝大多数法国移民的心态，但是，难以调和的民族矛盾注定要让加缪的愿望化为泡影。

通过《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恒河的女人》《印度之歌》《广岛之恋》《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等一系列文学作品，杜拉斯在东方创造了神话。童年和青少年的经历成了她创作的源泉，她巧妙地把创作与东方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情人》中，她用独有的叙事方式向读者展现了自己成长于法属殖民地、最终又回到法国的不寻常的经历，其中包括文化身份的嬗变，这一过程其实是殖民帝国解体的必然结果。杜拉斯经历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越南度过了十八个年头，之后回到法国，从文化的角度看，她的创作具有丰富而多变的内涵。她常常不惜笔墨描绘出一幅幅异国他乡的生活场景，换言之，也就是

她童年、少年时期的经历。两种迥异的文化在她的笔下交相融合，她的作品中总是弥漫着浓郁的东方情结。“东方”这个在其作品中几乎缺席的词汇，却像一个幽灵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作为在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出生并长大的法国人，杜拉斯一方面试图逃避童年亲历的“东方事实”，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回忆和想象重构她所认识和理解的东方。可以说，杜拉斯的写作历程，也是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其中不乏痛苦和困惑。杜拉斯生活在回忆和想象之中，她的心总是在别处，她的身份既非东方也非西方，就像加缪的“地中海身份”一样，杜拉斯的东方身份认同和构建也是乌托邦。

加缪和杜拉斯是在国外长大的作家，从小受到“他者”文化的耳濡目染，以至成人之后出现了文化身份的危机，而昆德拉的经历则是反方向的，他是成年之后才流亡到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了两个不共戴天的死敌。为了弥合差异、从边缘走向中心，昆德拉皈依欧洲小说的创作传统，表现出对法国文化的依恋和守护，力图在精神上回归他心目中的欧洲。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和构建几乎贯穿于他所有的作品之中，《无知》中身份的迷茫以及《生活在别处》中身份的模糊，都能够或多或少地折射出这位移民作家的心路历程。流亡的生活进一步强化了他对身份的敏感，昆德拉的文化身份是迷茫的、模糊的。但是，这种对迷茫模糊身份的追寻正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仅是其作品诞生的土壤和养分，而且是其笔下人物的灵魂。昆德拉加入了法国国籍，试图构建一种所谓的“欧洲文化身份”。但是，文化身份的构建谈何容易？他的作品多半与故土捷克关联，“去国怀乡”情结难以割舍。作为当代移民作家的典型代表之一，米兰·昆德拉是说不尽的。他究竟是“捷克之子”，还是“法兰西之子”？抑或是一位“法籍捷克作家”？作为一个承受过深刻历史之痛的移民作家，曾经的被迫流亡生活在他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创伤，他从心理上拒绝，甚至抵触回归故国，但在情感上依然自觉或不自觉地牵挂着滋养他成长的故土，牵挂着捷克民

族。具有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要真正告别原有的文化身份是不容易的。昆德拉“欧洲文化身份”的构建注定是复杂的、痛苦的、难以实现的。

身在异乡，异化的痛苦无处不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女主角特蕾莎曾经说过：“一个人生活在异国，就像在空中行走，脚下没有任何保护，而在自己的国家，不管什么人，都有祖国这张保护网，一切都颇具人情味，因为，在祖国，有自己的家人、同事、朋友，可以用童年时就熟悉的语言毫不费力地让人理解。”（昆德拉，2003：93）特蕾莎对异质文化感到的陌生与恐惧，其实就是昆德拉本人的切身感受。然而没有选择，只能硬着头皮顽强地应对。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到《不朽》，昆德拉的创作表现出了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由以往对捷克题材的单一关注转向对西方题材的综合考量；二是对抽象的生命意义更为集中和直接的探讨。（李凤亮，2003：107-112）在异国的生存境况促使他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改变。昆德拉逐步把移居初期对故国的眷恋之情搁在一边，而把目光投向了更加深远、更加广阔的艺术空间，不断加重小说的哲理与思辨色彩。

勒克莱齐奥算不上是个“移民”作家，但是一生中有无数次的国外经历。他是个百分之百的白人，身上流淌着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血液，但是童年时期的非洲之行让他与黑人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让他在内心深处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非洲人”。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到他对非洲的大海、蓝天、草原的歌颂，也能够发现他对多灾多难的非洲同胞的理解和同情。无论是《沙漠》《流浪的星星》，还是《奥尼恰》《非洲人》，细心的读者都能够感受到作者文化身份上的焦虑和困惑。被誉为“另类的世界公民”的勒克莱齐奥始终关注“隐藏于主流文明的底部与外部”的人群，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强势的主流文明对弱势的边缘文明的侵略与欺凌，“都市文明人”对外来移民者的歧视与压迫，以及现代文化与原始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勒克莱齐奥

没有将矛盾的根源归结于“文明”必然替代“野蛮”的趋势，而是以一种冷静的，近乎“上帝”的视角深刻揭示了所谓先进文明对生态的破坏，以及对人性中质朴、善良与真诚等美好品质的摧残。工业化与城市化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联系，却不可避免地疏远了人与自然的联系，隔膜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交流。唯利是图几乎成了“文明人”唯一的追求，城市就像是禁锢的牢笼。《沙漠》试图通过一个“化外之民”对都市文明的观察来揭示出现代文化的弊端。

从血缘关系上说，勒克莱齐奥不仅是白人的后代，而且接受的教育主要来自欧洲。但是在文化身份上，他则与弱势种族有着亲密的关系。他不止一次地有过成为“非洲人”的幻想，幻想自己是黑人的后代。在《奥尼恰》中，作者塑造了樊当那个人物形象，让他替自己在非洲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追寻。勒克莱齐奥看到了世界的不公和残酷，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描绘了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理想王国，以及那些挣扎在文明和社会边缘的苦难者。这种对弱势文化的颂扬和对白人文化身份的否定，正是其作品的魅力之所在。这就是勒克莱齐奥，一位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法国作家。在文化身份上，勒克莱齐奥一直在做梦。在《非洲人》里，他一会儿梦见自己的母亲是非洲人，一会儿梦见自己是非洲人，一会儿又觉得自己的父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洲人。总之，文化身份的问题在他的笔下是不确定的，游移的，杂糅的，难以表达清楚的。

胡方的历史题材小说《红色巴西》对法国殖民侵略历史的反思是深刻的，是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的文明史可以说是征服的历史。西方人希望对自然界不断的征服与改造来建立自己的文明，因此在构建和强化的过程中，“征服性”在他们身上凿下了深深的烙印。《红色巴西》不仅在于展现16世纪法国殖民扩张的生动画面，而且在于以人道主义的眼光和批判的姿态来直面和重审这段历史。女主人公科隆布第一次接触土著人，就觉得找

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毫无顾忌地融入到印第安世界中。

“文明”与“野蛮”的鲜明对比，实际是作者对欧洲文化的一次犀利讽刺，也是对印第安文明的一次公正解读。科隆布要逃离小岛，疏远欧洲文明，并心甘情愿被印第安人同化，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她放弃了殖民者为她设定的身份——翻译，转而尝试去寻求另一个身份，重塑另一个自己，不依附于任何人，也不受制于任何人。她拒绝与殖民者苟合。在她的眼里，“文明”小岛上充满了仇恨和斗争，“文明人”腐败堕落，残酷暴虐，把小岛推向了崩溃的边缘。相反，“野蛮”大陆却美丽富饶，宁静和谐，一片生气勃勃，丛林中的“野蛮人”和平相处，相安无事，守护着他们的家园。有着欧洲文明与印第安文明双重体验的科隆布在精神导师佩罗的指点下洞察了真相，对文明和野蛮做出了理性的判断，也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印第安文化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科隆布。那是“一个彻底摆脱了种种疯狂行为的新世界，一个令人尊敬的世界……一切都是神圣的：花、悬崖、山中溪水。无数精灵附在物体、景色和人的身上，保护他们”。（吕芬，2007：389）“印第安人谦逊纯洁。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占有，妻子们从来没有嫉妒和争风吃醋的丑陋嘴脸，全部和睦相处。他们广博的爱是文明人永远不想去理解也无法理解的”。（李焰明，2008）

在原始天地里，女主人公找到了远比欧洲文明更为真实的感受，而且在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中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她从欧洲文明社会的人变成了巴西原始丛林的印第安人。作为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的先锋，胡方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生活和工作过。遇到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促使他对所从事的人道主义事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要表达的远不止对殖民主义的控诉，而是对历史的正视和反思。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走向，最终却殊途同归，这才是小说的寓意所在。胡方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化认同中的“异”与“同”、“自我”与“他者”；因为“异”才有了“自我”与“他者”，而“同”便是那亘古不变的自然；“异”不能超越“同”，

“同”无法消除“异”，这便是自然界相克相生的轮回状态。

《红色巴西》通过描写女主人公对白人世界的否定、对印第安文化的认同，颠覆了西方传统的白人中心主义思想，揭示了殖民者给殖民地带来的灾难和破坏，促使我们对文化身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究竟是谁毁坏了南美洲印第安人的那片热土？又有谁才能拯救那里贫穷落后的民族？土著人的命运是靠自己还是靠他人才能得以改变？真正残暴的刽子手是吃人肉的人？还是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十分深刻的文化身份问题。胡方歌颂的是处在弱势地位的“他者”文化，试图解构的是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因为在介入中东、非洲和拉美的人道主义行动中，他在身份上感到很困惑，时常有种重新踏上了前殖民者足迹的感觉。

结 语

总之，透过对阿尔贝·加缪、玛格丽特·杜拉斯、米兰·昆德拉、勒克莱齐奥、让-克里斯托夫·胡方等人创作倾向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发现这些作家以及他们笔下人物的文化身份具有流动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尽管我们分析的文学作品创作于不同的作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些作品实际都围绕一个共同主题的存在而进行特别变奏，并且彼此之间进行着相互的补充。作品中的人物常常都怀着一种逃离意识，不断与原有世界进行决裂，不断地追寻自己存在的价值，在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中实践着对文化身份的再认识。显然，法国作家以独特的视角生动描绘了身处异质文化语境中的人物非同寻常的心路历程，深刻揭示了其内心的复杂矛盾，尤其是文化身份上的忧虑和困惑。所有这些其实也是作家本人经历和情感体验的艺术再现，是发自内心的文化诉求。一句话，“文化身份”为我们了解法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感受到了艺术的伟大和人性的光辉，与此同时，也充分感受到这种认同和构建多半是乌托邦。

参考文献

柳鸣九、沈志明：《加缪全集（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李凤亮：《遗忘·回忆·认同——从“昆德拉现象”看移民作家文化身份的变迁》，
《天津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2期。

让-克里斯托夫-吕芬：《红色巴西》，李焰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李焰明：《用爱情小说讲那段法国霸权》，《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4月15
日第4版。

Albert Camus. *Théâtre, Récits, Nouvelles*,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Gallimard, 1962.